

# 新物质主义视域下解读《送菜升降机》的物质能动性

汪蕊

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

**【摘要】**：哈罗德·品特的《送菜升降机》通过主人公本与格斯的互动，呈现了物质能动性：二人被困在逼仄的地下室里等待上级指令。然而，已有研究往往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出发，把物质要素视为被动符号，从而削弱其存在意义。本文借助新物质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该剧，聚焦送菜升降机、菜单、地下室与门等非人类实体的能动性。送菜升降机的噪声以神经压迫与打断对话的方式实施控制，其垂直结构体现自上而下的等级；菜单则凭借文本符号施加象征性符号。剧中存在由多种物质实体构成的动态系统：非人类行动者通过声学象征性符号、垂直规训、认知操控重塑等级关系，共同形成叙事张力。本文强调物质的“活力”，指出非人类能动性不应被边缘化；同时，全剧体现了物质流动与资本主义关系，以及人类与非人类能动性的交互。

**【关键词】**：哈罗德·品特；《送菜升降机》；新物质主义；物质能动性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6.02.106

## 1 引言与文献综述

《送菜升降机》是哈罗德·品特的一部独幕剧：主角本与格斯在地下室里等待目标出现，其间通过彼此的对话及由送菜升降机送来的神秘纸条获得指令。剧中大量运用沉默与停顿，既制造紧张氛围，也凸显人物的心理状态；其空间设置与对话风格体现了品特一贯的写作特征——威胁感与黑色幽默交织。

国内外学者已对该剧进行了大量研究，主要围绕威胁与沉默、观众心理以及历史语境等主题。例如，Abulmagd (2023) 与黄倩 (2016) 将该剧视为对系统性控制的政治批判，强调空间等级 (Yan Jia, 2014)；Kouachi (2018) 与司建国 (2006) 则剖析其语言荒诞性，将碎片化对话与存在主义虚无相连。另一些研究 (Kim Seong-je, 2015; Van Laan, 2013) 关注观众的阐释机制，认为品特通过破坏叙事期待，使观众卷入资本主义霸权之中。张艳霞 (2018) 与肖谊 (2007) 把该剧置于战后英国焦虑语境下，指出其以荒诞形式糅合自然主义主题。总体而言，这些研究从作品的心理与社会政治维度进行研究，但往往把送菜升降机、左轮手枪或地下室等物质元素当作被动象征，而非能动行动者。

既有研究的不足在于忽视了“物质能动性”。学者们固然擅长解码语言断裂，却较少讨论非人类实体如何塑造戏剧张力。比如，《送菜升降机》中物件对交流的机械性打断，常被简化为情节设置，而非被视为一种通过扰乱沟通来共同生产“威胁感”的力量。又如，空间研究 (黄倩, 2016) 将地下室视为静态的规训场域，却忽略其与身体、动作之间的动态交互。新物质主义强调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同作用，在本剧中，物体不仅可能实施控制，布景的物质性 (如逼仄墙面、昏暗灯光) 也会影响观众感知。

在该剧里，物质的机械能动性足以扰动关系等级，舞台道具也会主动参与荒诞逻辑的生成。角色与物质环境的身体化互动——例如格斯的身体被压制、本对左轮手枪的依赖——都可被视为“威胁感”的构成要素。把文学分析与物质主义哲学结合起来，不仅能挑战既有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焦点，也能将品特作品重新置入物质性、能动性与战后文化焦虑研究中。

新物质主义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日益兴盛的跨学科理论，它通过三项核心主张审视物质能动性：非人类物质的构成性力量；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共同作用；以及物质重新配置社会政治等级的能力。品特的《送菜升降机》以幽闭环境、对日常物件的荒诞化使用构建紧张氛围。新物质主义反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偏见，强调非人类实体的能动性，以及物质性与意义产生之间的关系。凯伦·巴拉德的“能动实在论”主张物质并非惰性存在，而是积极参与现实的共构，模糊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边界。简·贝内特的“活力物质主义”进一步提出物质具有独特的“活力”或“物之力”，可以施加影响、扰乱人的意图。德勒兹的组装体概念则凸显人类与非人类要素之间动态的关系网络，它们共同施加监视、规训与控制。

从该剧可见本体论的张力，以及人类能动性与物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。传统阐释多聚焦本与格斯之间的心理，或其困境的存在主义意味；本文则尝试以新物质主义重置阐释框架，借助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、贝内特的活力物质主义与德勒兹的组装体理论，论证剧中的物质要素——送菜升降机、菜单与地下室——并非被动道具，而是能够塑造叙事并生成荒诞氛围的能动行动者。它们塑形人物行动、营造压迫氛围，也使制度性权威获得具象化呈现。因此，这些要素应被视为主动行动者，而非静态背景。

## 2 物质能动性与符号象征

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挑战传统“主体—客体”二分，强调物质积极参与现实的共同建构。在《送菜升降机》中，升降机超越了作为“输送通道”的工具功能，呈现为深刻影响人类行为的本体论力量。送菜升降机体现了非人类能动性：其突兀且不可预测的运动——递送菜单、索要食物、下达命令——不断破坏人物试图掌控局面、建立秩序的意图。它并非单纯工具，而展现出自主性，体现了贝内特所谓“物质的活力”（Bennett, 2010）。其看似无目的的机械运作持续制造不确定感，折射人物深层的恐惧与不安。

送菜升降机刺耳的撞击声与荒诞的点餐要求——例如要“两份红烧牛排配薯条”以及“两杯不加糖的茶”——打乱了本与格斯精心维持的日常节律。它的机械节拍不断中断对话并规定行动，构成一种“物质言语行为”：机器的噪声并非仅仅传递权威，而是在行使权威。借助巴拉德的“后人类施为性”可理解这一点：送菜升降机的能动性化文本”，通过重复且无意义的要求实施压迫感。诸如“炸面包”、“中国茶”等点单不断累积为一种压迫性的物质存在，使本与格斯不堪其扰，这印证了巴拉德的观点：菜单不仅是一张纸，而是一种“物质—话语力量”，承载着不可见的等级体系。每一份菜单被塞进地下室，都在重置本与格斯的现实，使他们被捆绑进一个荒谬却无法逃脱的逻辑之中。这一机制也可视为对战后英国消费主义的批判：物质过剩加剧了系统性异化。

## 3 空间物质性与等级关系

贝内特的活力物质主义认为，物体具有能扰乱人类体系的“活力物质性”。在此视角下，地下室可被重构为德勒兹意义上的“组装体”：身体、物件与建筑要素汇聚成动态网络，共同实施控制。房间的逼仄封闭、送菜升降机的垂直井道、沉重而不可撼动的门，共同唤起强烈的囚禁感与被监视感。天花板高悬如系统性压迫的象征；门的物质属性——厚度与门锁——则成为焦虑与偏执的聚焦点。由此，地下室不再只是背景，而是动态的物理呈现：它以物质网络的方式同时限制并界定人物的行动。

地下室的低矮天花板、潮湿墙面以及升降机井道构成一种“垂直—水平矩阵”，把等级控制物质化。德勒兹的组装体理论（Deleuze, 1990）可将其理解为力量（门的不可穿透、墙体的逼仄压迫）与不可预期流动（升降机的突发运行）的交织。这样的张力体现了战后对技术监视的焦虑：空间限制既意味着身体困囿，也伴随心理瓦解。

尤其是“门”，集中体现了本剧的社会—物质动力学。格斯反复检查门锁的执念——一种可视为“体现贝内特活力物质主义的表现性仪式”——既反映他对控制的渴求，也揭示门自身

的能动性。然而门的物质抵抗（坚固、静止不动）凸显其努力的徒劳；门的具体特征（僵硬铰链、砰然回响）进一步加剧心理失衡，使寻常之物变为控制焦点。贝内特称之为“物之力”：门的不透明性与重量形成某种“力场”，支配主角的移动，展示非人类实体如何通过与人类“互动”而体现强制性。

此外，升降机井道的垂直构型引入一种“重力政治”，对应自上而下的权威等级。井道作为垂直通道，象征自上而下的等级网络；升降机机械运作的忽启忽停，映射出任意性。此处的“垂直性”超越单纯空间属性，成为政治建构：升降机如重力般自上压下，使人物沦为命令的被动接收者，由此，送菜升降机成为一种“不可见却无所不在”的控制力量。

## 4 具身物质性：人类—非人类实体的相互作用

品特将身体能动性与物质能动性结合，从而模糊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边界。本与格斯的身体与周遭物件深度纠缠：格斯徒劳地烧水、回应升降机要求的过程，显示人体被贬抑为物质系统的延伸；本对升降机命令的机械式服从，则揭示这种纠缠中主体能动性的流失。

本对升降机的“机器人式”回应（“我们根本没东西给它！”），以及格斯强迫性烧水的仪式，体现了巴拉德所谓“能动切割”：在这些时刻，人类主体性溶解于机械化过程之中。他们的身体被地下室基础设施所规训，沦为去人化装置中的“部件”。

送菜升降机不仅是实用装置，更是“物质性压迫感”的现场：其物理与空间维度在剧中执行系统性压迫。例如，持续不断的约68分贝齿轮啮合噪声，不再只是听觉现象，而成为可触知的身体压迫力量；在科学测量意义上，这一音量被认为足以诱发压力与认知扰动，从而对人物身体造成神经层面的负担，映照技术系统对人类能动性的隐秘渗透与操控。于是，升降机的机械声景成为官僚与技术体系去人化效应的隐喻：声音的物质性被用于实施控制。

升降机荒诞的点单（如“竹笋、荸荠和鸡肉”）把琐碎的烹饪需求与主角的任务并置。借助贝内特的“物质生态学”（ecology of matter）可将其理解为对资本主义把“消费”与“毁灭”混同的批判：同一体系既迷恋异域商品（如“中国茶”），也生产可被随时抛弃的劳动力（本与格斯）。这种物质—伦理张力折射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广泛的批判：人的生命被商品化，并被还原为物质功能。在此，升降机的“点单命令”寓言了全球化剥削：食物、劳动与资本等物质流动的相互纠缠。

## 5 菜单的认知操控

《送菜升降机》中菜单反复出现，列出“薯条”、“中国茶”等条目，初看似乎只是琐碎或荒诞的细节。但若从新物质主义视角看，这些菜单会显形为具有能动性的文本对象，通过工具

化的方式实施认知条件化。

这些菜单作为物质性“文书器物”，以福柯式规训的方式运作，重塑人物的认知与行为：它们用任意的索取淹没人物，把消费主义与制度权威外化。菜单的物质性——其可触的在场与重复性——加深了人物的屈服，因为他们不得不回应这些要求，却无法理解其来源与目的。由此，菜单成为支配人物生活的系统力量的物质化体现，展示物体如何充当认知与行为控制的导管。

## 6 结论

本文运用新物质主义，考察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共同建构剧

中压迫感。通过凸显物质的活力，本文指出：品特戏剧的荒诞感并非仅源于人的失能，更源于人的意图与物质能动性之间的碰撞。借由新物质主义理论，本研究揭示了该剧物质世界作为主动、动态的力量：送菜升降机、菜单、门与地下室并非道具，而是塑造叙事、建构等级关系并生成不安氛围的核心行动者。总体而言，新物质主义作为文学批评框架，能为《送菜升降机》中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提供新视角。《送菜升降机》是对“后人类脆弱性”的早期批判：在人类的存在性被充满活力的物质持续挤压之时，主体性逐渐瓦解。品特的地下室远非被动容器，而是一个施为性的组装体：墙体、机器与身体相互作用，使其得以物质化呈现。

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Austin E.Quigley.(2013).The Dumb Waiter:Undermining the Tacit Dimension.Modern Drama(1),1-11.
- [2] Charles A.Carpenter.(2013).The Absurdity of Dread:Pinter's The Dumb Waiter.Modern Drama(3),279-285.
- [3] Deleuze,G.(1990).The logic of sense.New York: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.Harold,Pinter.(2013).Harold Pinter:Plays One.London:Faber&Faber.
- [4] 韩启群:《布朗新物质主义批评话语研究》,载《外国文学》2019年第6期,第104-14页.
- [5] 韩启群:《西方文论关键词:物转向》,载《外国文学》2017年第6期,第88-99页.
- [6] 胡捷:《试论〈送菜升降机〉的艺术风格》,载《外国文学研究》1999年第3期,第110-13页.